

认知叙事学视域中语篇连贯的翻译重构

杨志亭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语篇连贯具有认知属性,依赖于读者对文本叙事的认知解读,被看作是文本叙事范式的评估标准,而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如要在目的语文本中再现源语文本中的叙事模式,就意味着译者要对原文本的语篇连贯结构进行认知分析和叙事识解,通过重新构建连贯结构让目的语读者获得完整而有效的叙事解读。认知叙事学结合认知科学与叙事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可以寻求叙事的连贯结构和读者解读文本背后的认知规律,为翻译的再叙事研究找到认知基础,从而为叙事连贯的重构提供合理的解释力。

关键词:认知叙事学;语篇连贯;重构;作为再叙事的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1)01-0105-08

0 引言

认知叙事学是认知科学与叙事理论相结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分支,它基于读者所共享的心理原型,借助认知框架理论将读者对文本的阐述和接受过程进行认知分析,其采用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重新审视叙事学的主要概念和方法,极大拓展了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范畴和研究内容。认知叙事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若干研究范式,如Herman(2002, 2009)的“故事逻辑”与“世界构建”、Fludernik(1996, 2003)的“自然”叙事学、Jahn(1999)的“花园路”叙事、Ryan的(1991)“认知地图”等等。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包括申丹(2004)、唐伟胜(2013)以及刘世生、庞玉厚(2011)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叙事学还是认知叙事学,无一例外探讨的都是源语文本的叙事话语,并没有关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读者进行叙事解释时的差异。认知叙事学在试图揭示叙事构建形式和读者解读背后的认知规律时,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未进行区分,从而忽略了翻译文本进行再叙事时的特殊性。

语篇连贯性是文本叙事范式的评估标准,是文本叙事理论中的常见概念。作为构成文本性(texture)的基本要素之一,连贯通常用于语篇分析之中。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连贯性是故事讲得通顺、完整、易于接受的根本;而从认知心理的角度看,连贯具有认知属性,是读者对叙事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作为语篇叙事的认知表征,连贯对读者的认知叙事建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连贯即叙事,连贯的语篇意味着叙事的建立。对于作为再叙事的翻译,译者要在目的语文本中重新构建连贯性,以便读者通过认知活动获得完整而有效的叙事解读。因此,从认知叙事学的视角对语篇连贯进行分析,可以深入探索连贯在翻译再叙事中的认知机制和重构途径。

收稿日期:2020-11-16

作者简介:杨志亭,男,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1 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

对于“叙事”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从 Fisher 的定义中找到对其认知理据的解释。Fisher 把叙事界定为“理解和评估所有信息的语境——不是叙事构建者有意选择的话语模式,而是我们最初理解话语的知识形态”(Fisher, 1987:193)。不同于经典叙事学对文本本身的叙事解释,认知叙事学通过认知框架、图式、认知世界等理论视角,探究人类构筑叙事、理解叙事的共有认知心理模型,所以后者不仅关注文本本身所呈现的叙事,更关注文本内外的语境对叙事阐释所产生的影响。申丹(2004:1)将内外语境分别称为“叙事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前者指构成叙事及区分不同类型叙事的文类规约,后者指与叙事构成和解读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包括作者与读者的种族、性别、社会身份等等。针对这两类语境,申丹认为对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类规约语境,而与社会历史语境关系并不密切,因为“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申丹,2004:2),所以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申丹,2004:2)。显然,在同一语言文化环境下,由于读者分享共有的社会历史认知框架,其叙事认知不会过多受非文类规约语境的影响,但在翻译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中,社会历史语境不可避免会影响目的语读者的叙事认知,因为翻译是在目的语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源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对话中所产生的特定话语建构行为,社会文化认知的差异必然会造成目的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对叙事的不同解读,此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在作为再叙事的翻译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认知意义。

翻译本身既是叙事也是认知。不同于单纯对源语文本的叙事解读,翻译涉及包括对文本进行叙事和再叙事的双重叙事活动,同时也是译者作为原文读者对原文本进行叙事认知和作为译文作者对译文进行再叙事认知的双重认知活动。无论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叙事,还是脱离了情节设定的非文学叙事,在翻译过程中都表现为讲故事,或者更具体地理解为复述故事。译者扮演着故事复述人的角色,把原文本中的故事复述给译文的读者,所以翻译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即对文本的“再叙事化”(renarrativisation)。作为一种后经典叙事行为,“这种再叙事化,或者叫做复述(retelling),不同于传统的模仿或复制,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对模型的改头换面。”(Herman, 2005:460)

对叙事的语言转换意味着译者对原文本的叙事结构进行复制或重构,译者首先需要对源语文本中的叙事模式进行认知解读,识别原作者搭建的叙事脉络和叙事含义,并以目的语再现叙事的连贯性。此外,翻译的再叙事本质还可以在更宏大的框架范畴中进行考察,即把叙事看作建构社会的手段和必然归宿,如 Baker(2006)借用叙事学的概念和相关理论,通过框架设定(framing)模式将叙事与翻译联系起来,从而让传统叙事学的文本分析延伸至社会文化语境,构建翻译的宏大叙事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之下,叙事不仅意味着译者在目标语境中重构叙事,更意味着“译者有意或无意在翻译文本和话语的过程中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的构建、协商和质疑”(Baker, 2006:105)。

归根结底,无论是从微观还是从宏观的角度审视,翻译都可以看作是认知上的“再叙事”。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文本中重新构筑源语文本中连贯的叙事模式,让目的语读者获得完整而有效的叙事解读。

2 语篇连贯与叙事认知

2.1 叙事连贯的认知生成机制

连贯是语篇的认知表征,决定语篇连贯与否主要依赖于读者即认知主体的认知活动。王寅将体验哲

学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对语篇连贯作出解释,认为“语篇连贯并不一定要依靠衔接手段,而主要是靠心智上的连贯性取得”(王寅,2005:17)。语篇表层涉及词、句、段的衔接手段既非语篇连贯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只能为连贯性地理解叙事起到认知上的导向作用。只有叙事解读者将语篇内在的、表层的语言信息通过认知加工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并形成合理而完整的认知判断,才能构成叙事的连贯性。作为认知主体的读者通过文本表层的语言符号系统,将语言信号经由神经元传输至大脑,并在大脑中进行信息的分类、过滤、整合等加工过程,再借助分析、判断、推理和概括转化为读者认知系统的一部分,这样就在读者的心智中不断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叙事,最终完成对叙事内容的理解。

连贯的叙事总是表现出层级性、有序性、关联性和一致性,符合语篇解读者的认知规律,从而容易被接受。从认知角度看,连贯是语篇使用者在对文本叙事进行认知识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叙事的连贯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语言表层)的显性关联,更表现在对概念关系、语义关系、逻辑关系或修辞性等隐性关联的认知推理。语篇连贯在语言层面的“象似性”表现为语篇连接标记(衔接手段)的使用、语篇信息分布(主述位结构)的一致以及语域与语言形式的统一。但连贯是认知过程在语言系统中的映射,所以认知上的“象似性”更为重要。

叙事连贯的认知生成机制反映了文本内外诸多要素之间的潜在连接,叙事解读者借助记忆、识别、复现、推理、判断等认知手段完成连贯的建构。统一的认知框架成为特定语言使用者之间生成和理解语篇的必要条件,也建立了相同认知环境下叙事连贯形成的基础。王寅(2005:17)用“认知世界”这一概念描述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内化并储存于个人心智中的知识,它“既可以是人们早已获得的共享知识,也可以是在当下语言交际中刚刚建立起来的知识”。Minsky(1977)用“框架(frame)”这一概念描述人们头脑中储存的、表征特定情境的信息结构,其作用是帮助人们从中提取有用信息来理解文本。“框架”其实与“认知世界”属于同一概念,都是用来表示认知过程中可以调用的知识资源,其中不仅包括语言规则,还包括在特定语境下人们认识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是已经在头脑中形成的固化的、常规的、完整的认知系统。类似的概念还包括 Schank & Abelson(1977)的“脚本(script)”、Sanford & Garrod(1981)的“情景(scenario)”以及 Cook(1994)的“图式(schema)”等等。“框架”这一概念涵盖了“图式”、“脚本”“情景”“认知模式”等术语,在 Fillmore 建立的框架理论中,框架被视作“特定的、统一的知识构架或经验的连贯图式化(coherent schematizations)”(Fillmore,1985:223),即通过生活经验获得的认知概念结构,所以又被称之为“认知框架”。认知框架中的“图式”概念用于揭示语篇与框架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关系,为研究“叙事结构如何激活读者的心智图式从而使语篇产生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相应的认知图式理论被看作是话语连贯的理论,用于“分析叙事理解的动态认知过程”(唐伟胜,2013b:35)。由此,叙事的连贯性意味着一个语篇中所提供的信息可以通过图式激活机制在心智中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即借助认知框架建立语篇意义的合理性与整体性,这样语篇就有了叙事的连贯性。

2.2 叙事连贯的读者认知解读

Fludernik(1996:12-13)认为叙事应摆脱对情节的依赖,拒绝把情节的顺序设置和逻辑联系当作叙事性的主要组成因子。她从人类体验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叙事,把叙事看作体验表征,即建立在真实生活体验基础上的认知或“自然”参数。从这个意义上看,叙事并非局限于故事型的文本,而是用来表征人类经验的认知方式,是读者从文本阅读中获得的一种意识。Herman 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叙事是专门对现存经验的已知属性进行评判的表征模式”(2009:137-138)。可见,叙事性不是文本的固有品质,而是读者将文本阐释为叙事,又对文本进行叙事化,从而将叙事性赋予了文本。因此,“认知叙事学表明,读者

不需要把文本看作具有叙事特征,而是通过附加的认知框架把它们读作叙事。”(Fludernik,2010:926)叙事可视为一种认知活动,而叙事理解就是照应、建构或更新大脑中认知框架的过程。

连贯性构成了文本叙事范式的评估标准,用于评估某一具体叙事的有效性。Givon指出语篇连贯是一种自然认知过程,是“能生成、储存和提取的语篇内在心理连贯”(1995:59)。正因为叙事连贯与语篇解读者的心理和认知能力密切相关,所以不同的读者由于认知框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使得叙事的连贯解读呈现出认知的个体差异。

读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通过认知活动,不断对各种信息进行获取、储存、转化和加工,不断丰富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认知框架,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能力与自身的思维方式、心智图式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不可分割。思维方式越活跃、心智图式越成熟,接触的社会文化越多元,认知体验就越完善,认知能力的发展就越有效。基于此,叙事解释呈现出动态特征,因为认知框架和叙事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套叠或递归的。人的认知框架和认知能力在不断地变化,从而为建构和理解叙事提供了新的认知途径。同样,叙事的连贯性也会随着读者认知心理的变化而得到重新评价。对叙事进行的修正是建立在读者认知框架的更新和扩充之上的。文学文本中或隐或现的社会文化信息不断进入读者的认知体验和加工过程,已知信息在复现和凸显中强化了认知经验,未知信息在通过某种渠道获得理解后变为认知增量,纳入认知框架体系。文学叙事如此,非文学叙事亦如此。我们的大脑不仅对有情节设计的故事进行叙事解读,同时对抽象的理论也使用叙事的思维模式进行认知加工。概念化的信息也需要借助认知叙事过程得到解释,同时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添加到先有的叙事认知体系之中。

毋庸置疑,读者对文本的叙事解释受语境的制约。语篇分析方法通常把语篇连贯分为言内和言外两个层面,这实际上分别对应于申丹所区分的“叙事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即文内连贯与文外连贯。按照认知叙事学的视角,语篇连贯可以读者进行叙事识解的方式进行范畴化分类,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即读者如何理解文内的语义连贯、如何建立文内与文外之间的语用连贯以及如何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建立起文本的文化连贯。Rabinowitz(1987/1998)曾经提出了叙事理解中的三类读者模型,即“叙事位的读者”(narrative audience)、“作者位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和“实际位的读者”(actual audience),分别表示置身于叙事世界并对其深信不疑的读者、对叙事世界持有冷静客观态度的读者和身处具体现实历史语境中的读者。“叙事位的读者”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解决文本叙事世界中的连贯问题,“作者位的读者”通过激活心智图式寻求隐含的信息与文本细节中的连贯问题,而“实际位的读者”把文本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以期完成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连贯关系。这三类读者在叙事建构过程中借助三类不同的图式解决三类语篇连贯性的问题。语类规约图式帮助读者建立了文内连贯,即文本内部语言层面的连贯关系,文类规约图式实现了文内与文外的连贯,如语用对等关系,而社会文化规约图式是用来实现文外连贯的。

因此,建构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认知语境(既包括“叙事语境”也包括“社会历史语境”)是获得连贯性的叙事理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翻译活动中,这一认知语境需要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者兼读者、译文读者所共享,所以翻译是以上四方共同参与的认知叙事活动。

3 连贯重构与翻译中的再叙事

3.1 评价叙事范式的连贯性原则

译者必须在目的语语篇中“重新构建具有同等价值的连贯结构”(Neubert et al.,1992:93),这意味着

原文本的叙事模式要通过语言的转换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框架内得到映现。在阅读过程中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的认知进路相同,都会对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能指与现实世界中的所指进行对比,如果两者匹配,则读者顺利识解各种概念关系或语义关联,无需寻求新的框架知识就能较为轻松地获得连贯的叙事理解,而一旦文本外部知识经验无法覆盖文本内部信息,读者就会积极求助于新的框架知识,并借推理等认知手段重构对叙事的认知。可见,译文读者对语篇连贯性的认知过程是随着文本叙事语言的推进呈现线性和动态发展的,读者头脑中的认知图式不断被激活,认知框架不断被新的信息补充和更新,倘若读者的认知能力有限,则文本的叙事连贯就难以建立。

源语语篇的叙事模式,如时空及视角设定,不仅反映了叙事创建者心智世界内的经验结构、概念系统和认知模式,而且往往与源语读者的心智世界相契合,因为只有当叙事语篇在一定程度上与读者心智世界内的经验结构、概念体系或认知模式具有“象似性”,该语篇才会获得连贯性的解读。王寅(2007:583)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翻译中要建立起原文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这就需要译者在两种语境中对语义、语用和文化三个层面的连贯关系进行认知解构和重构,各个层面的连贯方式对于表征世界、构筑意义、激活认知图式、创建认知世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通过多种认知方式的协同互动,显性或隐性的连贯关系得以建立,从而构建意义连贯的叙事整体,有效强化文本的叙事效果。

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中,Baker(2006:143-164)借用Fisher(1987/1997)的叙事评估范式理论,把连贯性原则以及忠实性原则看作是叙事范式的评估标准,并具体阐述了三种类型的连贯形式:结构或论证连贯性(structural or argumentative coherence)、素材连贯性(material coherence)和人物性格连贯性(characterological coherence)。结构或论证连贯性是指叙事内部的一致性,素材的连贯指同类话题的文本之间的相关性,即外部的一致和完整,而人物性格连贯性指叙事所涉及人物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三类连贯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读者进行叙事理解时可能发生的认知识解过程。结构连贯对应了“叙事位的读者”,置身于文本内部,对文本本身所呈现的叙事进行连贯判断,从而注意叙事中“是否显示出形式或逻辑推理上的矛盾”(Baker,2006:144),而“作者位的读者”通过比较某一叙事与我们所熟悉的同类话题之间的相似性,寻求“素材的连贯性”,因为“没有故事是存在于真空中的,所有的叙事都嵌入在其他叙事之中,所以要从更广泛的语境中进行连贯的评价”(Baker,2006:146)。这和申丹所说的“文类规约语境”极为相似,即通过文类规约对叙事的指向性做出连贯与否的分析。略有不同的是,“作者位的读者”相对于素材的比较,更依赖于语用判断解释叙事中的隐含信息。但素材的连贯与语用的推理都是基于读者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分析。人物性格连贯性并非局限于小说类叙事,“人物”被Fisher定义为“对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所做的概括性感知”(Baker,2006:148),因此人物也包括叙事者,或叙事作者。从这个意义看,“人物性格连贯”指读者对叙事者话语的可靠性做出评估,这其实是包含在“实际位的读者”的识解过程中的,即把叙事者或叙事话语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对其阐释受读者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的影响。三类连贯从不同维度揭示出读者对叙事的认知评估。

叙事中的“人物性格连贯”标准与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花园路叙事(garden path)有密切的联系。文学作品中为达到特定的认知和审美效果,常常使用花园路叙事结构,表现为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规范的不一致或矛盾,从而导致叙述或聚焦层次的复杂,将读者引入歧途,使叙事产生不可靠的认知效果,所以此类叙事又称为“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当文本出现花园路叙事时,叙述者话语中的内部矛盾或者叙述者的视角与读者的预知规范发生冲突,读者对人物连贯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从而大大增加

了对叙事进行解读和认知的难度。此时读者的认知阐释框架会帮助读者首先进行协调性理解,即在认定文本的叙事是连贯的前提下,借助认知框架对文本叙事反复进行修正、否定、置换或重构。这一动态识解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取决于读者的认知能力和译者的辅助,倘若成功,那么读者会获得文本阅读的快感,从“不连贯叙事”中得到全新的认知体验,极大拓展其认知能力,丰富认知框架。要保证叙事识解的成功,译者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框架做出有效预设,以便选择适当的策略对这类特殊的叙事结构进行认知补偿,从而保证读者对叙事的连贯解读得到最大限度的认知回报。

3.2 语篇连贯重构的认知途径

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认知心理的形成和认知识解的方式会存在很大差异,从语义、语用和文化等方面要做到完全的翻译对等非常困难,译者的任务是在两种认知环境中进行协调、寻求平衡,以帮助译文读者构建与源语读者相似的认知世界。译者要考虑以何种方式重构语篇连贯模式才能顺利激活译文读者头脑中的认知图式,产生对文本叙事的有效认知。译文读者所认可的叙事连贯是一个以共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识解和建构的过程,是一次全新的认知体验。通过心理原型的关联作用,译文读者可以用最少的认知努力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此时,连贯性重构表现为创建认知关联,最大限度地地为叙事解读创造认知条件。在此过程中,语言符号系统的解码需要读者大脑中预设的语类规约来辅助完成,而表层语言形式背后的概念关系或意义关系则必须通过心智的激活机制,将文本信息与认知经验和先有知识联系起来。如果概念化的语言信息能够顺利激活读者已经建立的心智图式,则语篇连贯就能够顺利建立,完整的叙事得以形成,反之,激活失败、认知受阻、连贯失调,叙事性必然受到质疑。

文学类叙事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的隐性连贯,是造成译文读者产生叙事认知障碍的主要原因。在原语篇构建过程中,作者会根据文学叙事的特点,推测原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在文中省略他认为对交际双方不言自明的信息,或者隐含部分信息以便让原文读者自行填补和解释。这类文本中的信息“空白”对于和原作者共享认知框架的读者而言,会增加阅读中的认知推理,带动读者参加文本的再创造,从而带来更多的认知愉悦。但是,这类叙事上“空白”并非为译文读者而设,由于认知空缺,译文读者无法调用已经建立的或预先储存的知识,自然对“冰山一角”之下的内容很难作出正确的推理和判断。此时,认知框架或图式、优先策略等等都无法提供预设,缺省信息无法依赖读者的认知努力进行填补,连贯的叙事就很难建立。译者需要对隐性连贯中被原作者刻意省略的隐含信息作出积极推断,出于对译文读者认知能力的关照,在目的语语境中创建信息的最佳关联,把原文意图补足出来,从而帮助读者顺利完成连贯的叙事解读。

当然,译者首先应该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连贯模式而不会影响读者的叙事理解。为了应对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认知空缺,许多译者会利用语法及词汇手段,如省略、增益、改写等方式进行认知补偿,把原文的隐性连贯结构以符合目的语读者认知叙事习惯的方式进行“显化”改造,却往往忽视了译文读者通过认知努力对叙事进行自行修补的能力。

译文读者相对于原文读者出现的认知空缺既是连贯的叙事解读受到制约的直接原因,也是认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读者只有付出积极的认知努力去“越过大脑结构的空白”才能实现认知的再创造过程。Spolsky (1993:2-3)认为,蕴含模糊性的文本是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反映方式,填补文本中语言空白的过程可以让读者经历一个重要的、本质上属于创造性的认知过程。对话语连贯进行翻译重构,不应该对原有的连贯结构舍弃重建,而应该尽可能在保留原文连贯结构的前提下帮助译文读者调整和更新叙事的认知框架,一方面遵循原文本的叙事模式,将认知冲突施加于读者,期待读者通过不同的认知方式做出分析、

推理、判断,自行完成叙事的连贯性建构,另一方面可采用文外注释和注解的方式,协助读者获取新的认知体验,获得更多的认知增量,拓展社会文化认知框架。新认知一旦形成,原有的连贯认知阻碍也会得到调和与消解。对于特殊的叙事结构,如花园路叙事,译者的认知引导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可以借助语言规则填补读者的认知真空,构建新的认知语境,形成新的文化图式,完成叙事的再现。

不难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宏观层面上译者由于接触到的两种认知框架可能差别巨大,所以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叙事语言和叙事认知方式的影响,从而在“再叙事”的过程中产生翻译变形。但认知差异的客观存在,特别是社会文化认知的多样性,使得再叙事过程中由译者叙事策略选择所引起的变形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同译文读者的认知解读方式和结果千差万别,不同译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和对预设读者认知能力的判断都会影响到再叙事的连贯效果。但认知叙事学对于翻译中语篇连贯的重构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从而帮助译者寻求对译文读者认知关照的“普适性”原则。

4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认知叙事学从认知的角度探索文本叙事构筑中的基本问题,将读者的心理过程和认知方式纳入研究轨道,从而给予语篇连贯分析更多的维度,读者要获得文本连贯性的叙事理解必须经过多种认知维度的协同作用才能够获得。对于本质上作为再叙事的翻译而言,认知叙事学对语篇连贯的重构具有普遍的解释意义,如果能够把读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篇连贯问题放到认知叙事的大语境下进行考察,力争解决社会文化知识的激活和文化缺省信息的填补,则不仅可以顺利再现文本的叙事结构,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认知建构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M]. London: Routledge.
- Cook, G. 1994.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 di Semantica* (2):222-254.
- Fisher, W. R. 1987.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Fisher, W. R. 1997. Narration, Reason, and Community [G] // Hinchman, L. P. & S. K. Hinchman.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307-327.
- Fludernik, M. 2010. Narrat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Narrative [J].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Journals* (125): 924-930.
- Fludernik, M. 2003. 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 [G] // D. Herma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243-267.
- Fludernik, M. 1996.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 Givon, T. 1995. Coherence in Text vs. Coherence in Mind [G] // Gersbacher, M. & T. Givon *Coherence in Spontaneous Text*. Amsterdam: Benjamins,59-116.
- Herman, D. 2009.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M].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 Herman, D. 2002. *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erman, D., M. Jahn & M. Ryan. 2005.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M]. London: Routledge.
- Jahn, M. 1999. “Speak, Friend, and Enter”: Garden Path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gnitive Narratology [G] // D. Herman.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67-194.

- Minsky, M. 1977. Frame-system Theory [G] // P. Johnson-Laird & P. C. Wason. *Thinking 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5-376.
- Neubert, A. & G. M. Shreve. 1992. *Translation as Text* [M].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abinowitz, P. J. 1998.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yan, M. 1991.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anford, A. & S. Garrod. 1981. *Understanding Written Language* [M]. Chichester: Wiley.
- Schank, R. C. & R. Abelson.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M]. Oxford: Erlbaum.
- Spolsky, E. 1993. *Gaps in Natur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Modular Mind* [M]. Albany: SUNY Press.
- 刘世生, 庞玉厚. 2011. 认知叙事学初探——以电影《美丽心灵》中的文本世界为例[J]. 外语学刊(2):45-51.
- 申丹. 2004. 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9)1-8.
- 唐伟胜. 2013a. 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小说人物研究[J]. 外国语文(2):38-43.
- 唐伟胜. 2013b. 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叙事理解[J]. 外国语(4):28-36.
- 王寅. 2005. 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J]. 外语学刊(4) 16-23.
- 王寅. 2007.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Reconstruction of Textual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Seen from Cognitive Narratology

YANG Zhitin

Abstract: Textual coherence, with its cognitive nature, depends on the reader's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narrative, and is regarded as a standard to assess narrative paradigm.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in its nature, with the purpose of reproducing in the target text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source text, means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give a cognitiv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coherence structure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by reconstructing it ensure the target reader to obtain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narrative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narratolog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both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narrative theories, helps to explore the coherence structure and the cognitive rules in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a narrative. Therefore, cognitive narratology can provide a 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so as to offer an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coherence.

Key words: cognitive narratology; textual coherence; r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责任编辑:肖谊